



人大重阳

研究动态

责任编辑：胡海滨

审核：王文

邮箱：rdcy-info@ruc.edu.cn 联系电话：010-62516305

网址：http://rdcy-sf.ruc.edu.cn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第 12 期

2013 年 9 月 12 日

世界体系危机与中国崛起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贾晋京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是什么，是一次周期性危机还是根本性危机？遭遇重创的西方世界将一蹶不振还是浴火重生？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发展的挑战还是崛起的机遇？显然，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观察框架来回答。

在我看来，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产生自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需要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来驱动，即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而每当市场规模的扩张遇到



瓶颈时，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终克服，都是通过新市场的开辟。而新市场的开辟方式大体上可归为三种：1. 通过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创造新市场；2. 在地理上开辟新市场，即通过殖民或军事手段打开新市场；3. 通过金融手段把原先分立的市場连为一体。本次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关键在于：过去克服危机所采取的方式如今都难以为继。现今世界缺乏可以“推倒一切领域”的技术突破，军事手段开辟新市场的“边际收益”下降到零甚至为负，金融手段整合分立市场是西方仍在不断使用的方式，但“饮鸩止渴”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于是，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是根本性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占全球工业的比重却在加速上升，这与中国良好的“工业生态”有关。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中心将向东亚转移，但世界体系将如何演化，仍取决于新旧力量中心的合作博弈。

本次金融危机是体系性危机

要说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体系危机，首先就要说明这个导致危机的世界体系是个什么体系。实际上，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人会问，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早在 1973 年美国取消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值关系后就瓦解了吗？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君不见 2013 年 9 月 6 日闭幕的圣彼得堡 G20 首脑峰会，关于 G20 性质的官方说明就是“G20 是布雷顿森林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吗？判断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还在的判据应该是：只要美元还是世界货币，则世界经济体系就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的游戏规则是：美元与黄金按照 35 美元等于 1 盎司黄金的比值固定，其他国家货币则与美元挂钩。1973 年终结的是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值关系，但美元作为其他货币的主要储备货币的规矩至今依然在执行，因此当代世界体系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之后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元只是美国一国的法定货币，要给全球使用，就要建立一种使美元从美国输出到世界的机制。历史上，建立这个机制的第一步是马歇尔计划。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共向欧洲投放了大约 130 亿美元金融、物资和技术设备援助，在欧洲建立起大量当时先进的工厂，并且使欧洲有了美元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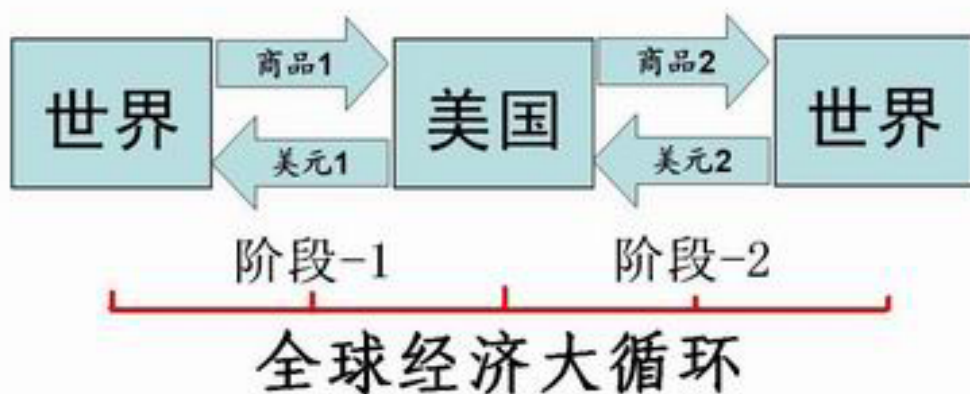
欧洲的工业体系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帮助得以恢复，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工业制品。欧洲制造、美国付款的跨大西洋经济圈建立起来。到 1958 年，美国首次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在此过程中，欧洲的美元储备大量增加，出现了“欧洲美元”（Eurodollar）一词。

然而，尽管美国印钞、欧洲制造的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之初十几年看上去是可行的，它实际上却存在着致命的内在缺陷。

1960 年，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他国家就必须持有美元才能进行国际贸易，为了获得美元，就必须向美国出售商品做顺差国，而美国则要不断向其他国家买东西，在贸易上做逆差国；而世界货币要求币值比较稳定，这就要求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卖出东西做顺差国才行，其他国家则必须成为逆差国。

美国作为逆差国和顺差国，都是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

要求，而这两个内在要求却是彼此矛盾的，这就注定了这个体系迟早要崩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深刻揭示了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内在缺陷。



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大循环

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形成如下模式：（1）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并以美元与其他国家交易；（2）美国同时向各国出口商品，以收回过量美元，防止美元超跌而丧失国际货币的信用。

1970 年代之后，美国实体经济逐渐衰落，美国寻找到“石油美元”作为美元国际货币的基础，并通过武器等高新技术产品和 1990 年代的 IT 产业出口，来回收美元，维持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循环。

但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耗尽了那种能够飞速发展以支撑不断膨胀的货币数量的“毁灭性创新”潜力。

但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这三件大事是 2001 年 9 月的“9·11 事件”、2001 年底中国加入 WTO 和 2002 年 2 月 28 日欧元区诞生。“9·11 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这实际上是通过军事介入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油的贸易路线，强行确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欧元区诞生后，欧元成为了一种具有匹敌美元潜力的替代性世界货币，这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胁。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欧元区油路的作用，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揍贬”欧元的武器。

为了给互联网泡沫之后“无处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个支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通过将美联储隔夜银行拆借利率降低到 1.0%，压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把资金引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而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也使得中国在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由于美国能够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国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向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这里的其他美元债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样，由于资金的流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泡沫化，在 2007 年造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由于其产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应用而导致的全球体系危机。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产业基础实际上已无可能恢复到足以支撑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程度，因此世界体系不可能复原，只能寄希望于重塑。



产业空心化导致的金融塌方

世界体系危机的形成根源在于：全球资本（金融）运行的中心仍在西方，但工业中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逐渐转移到中国。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在缺乏工业支撑的情况下要维持福利体系和高消费，只能依靠大量“印钞”。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设计中，货币的基础是国债，而国债的基础是税收。产业空心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税基流失，支出增加”问题，只能通过借债来应付。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经济体系承受能力，金融危机就会到来。

世界工业转移的大趋势是：在东半球，工业中心从日本移向中国东部，目前正在向西扩展，伸入欧亚大陆腹地；在西半球，工业中心在从德国向东扩展，逐步与俄罗斯连接。也就是说，工业网正在从欧亚大陆两端向中心扩展。其中，中国是全球工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

能够具体说明工业体系转移导致金融危机后果的例子是欧债危机。

追溯欧债危机的源头，其实可以从苏东剧变说起。1991 年苏东剧变后，前苏东集团国家普遍施行了“私有化”过程，原国有经济被廉价卖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东“私有化”的结果，“大头”最终不是由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而是由西德的资本家们得到！原苏东国家的工业基础原本就不错，这些企业被西德资



本家们得到之后，又获得了大量投资，升级改造。两德统一之后至今，德国已向原东德区域投入了超过 1.3 万亿欧元巨资。

从企业的逻辑来看，把生产转移到东欧是非常合理的：东欧工业基础良好同时工资低廉。即便在今天，东德的同岗位平均工资水平也只相当于西德的 70% 左右。然而当大量企业都遵循这一逻辑去行动，在国家层面，则产生一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的集中表现就是欧债危机——

苏东解体后的 1992 年，西欧国家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了统一货币进程。2002 年 2 月 28 日，欧元完全取代加入欧元区国家的原有货币，欧元区出现。欧元区出现之后，高工资、高福利、富裕的欧元区国家的人们，可以使用欧元向东欧国家购买工业产品，享受到了“印钞购物”的货币红利。结果，随着时间的积累，“去工业化”国家在向工业增长国进口产品，形成大量逆差，按经济规律应该贬值本币，但由于共同使用欧元不能贬值本币，就只能以发债借钱弥补，形成大量债务累积。它们发行的公债又被工业增长国（主要是德国）吃进，导致财富越来越流出西欧，流向德国和东欧；而西欧则越来越深陷债务泥淖。可见，欧债危机本质上是由西欧国家“去工业化”却可以享受欧元红利导致的。

然而西欧国家要想“再工业化”，却从根本上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在社会中占不到足够比例，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人口去支撑工业增长。对西欧来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去工业化”，本就不多的年轻人还找不到工作！在法国，大约四分之一 29 岁以下的年轻人找



不到工作，而在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将近五成！

由于《申根协定》的存在，协定国之间的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尝试去工业增长区域找工作，然而从工业增长区域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有更多人才可供选择，可以择优录用，于是，被录用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只能回到本国，成为本国的就业压力来源。这样对于“去工业化”国家来说，劳动力素质又出现了下降，更进一步阻碍了“再工业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不得不选择紧缩支出，勒紧裤腰带还债。但紧缩支出的后果是投资进一步下降，导致进一步“去工业化”……

概括而言，当前西欧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去工业化→债务积累→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失业→去工业化。在欧元区、老龄化、高生活水平三者并存的情况下，“去工业化”是无法阻止的过程，欧债危机也就是无解的。

可以通过美国、英国发生的情况来看看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QE）来收购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花掉了约2.6万亿美元，用光了当时的国债发行额度。所以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继续增加美元供应量，就得在未来增加税收，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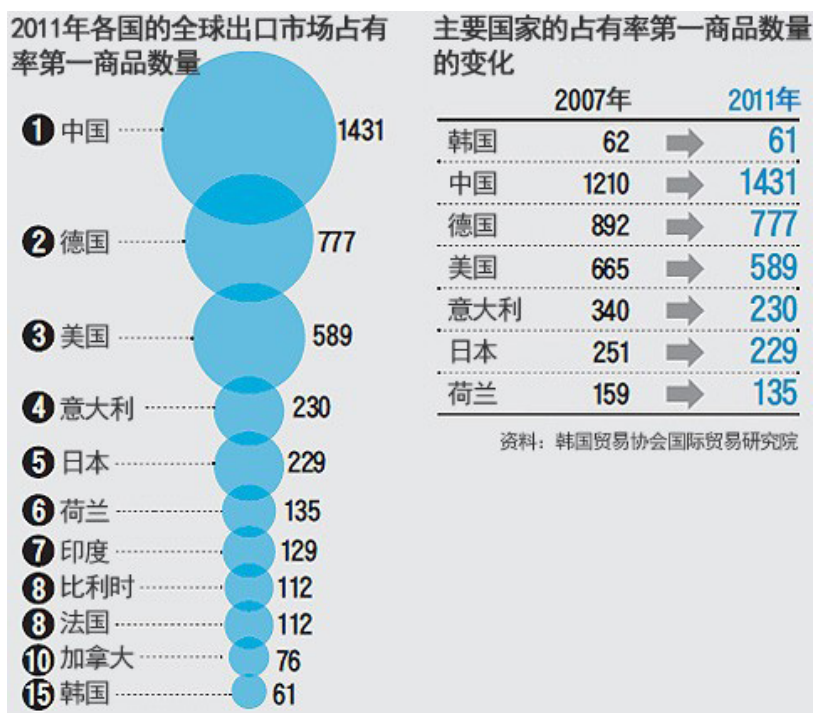
不过，当前美国有 3.15 亿人口，只有 1.15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 1.27 亿。而 1.15 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 6100 万人年工资低于 2 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 86.8 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比美国情况更严重的是作为世界金融运行中心的英国——这是一个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过 82% 的国家，而服务业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业。二战结束时，英国制造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达 70%，那时的英国可以说有一个技术领先的制造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制造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降至 16% 左右，服务业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却达到 80%。在服务业中，金融业收入极高但吸纳就业人口很少，大多数种类的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多但工资低、岗位不稳定。而英国制造业的情况是：出口额居首位的产品竟然是飞机发动机。这说明，当代英国经济是一个依靠金融这样的少数人产业和飞机发动机这样的最高端制造业来挣钱的经济，这样的产业注定吸纳不了总人口中那些缺少高级技能的人。因此，社会福利体系就会是一个永难填满的无底洞。如果收入增长能够保证这个无底洞还能继续填下去，这个游戏也还能维持。但问题是，在金融危机的局面下，金融业还能继续为英国赚钱吗？在全球经济萎靡导致民航业萎缩的状态下，飞机发动机制造业能为英国带来更多收入吗？

金融危机加速全球产业重心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但中国工业却取得了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份额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为 14%，到 2012 年则为 21%。在金融危机前的 2007 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 62%，而到了 2011 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是美国的 120%。

2013 年初，韩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发布了以海关编码作为调查依据的工业品出口量统计，结果表明：2011 年全世界工业品占据第一名的产品种类中国有 1431 种，第二名德国有 777 种，第三名美国有 589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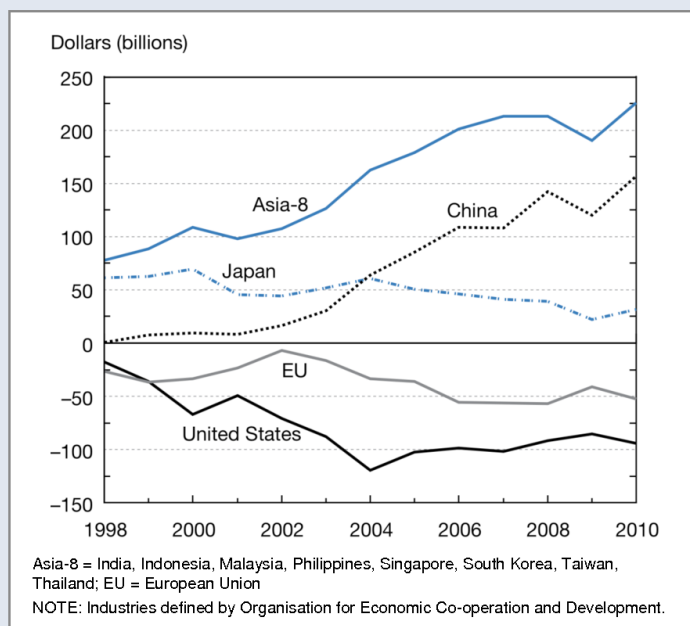
在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间，占世界第一位的产品数量，只有中国是上升的，其他国家都是下降的。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基本上被中国抢走了。全世界的制造业不但转向中国，中国也存在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一些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和企业的关闭是因为产业中心在向内地转移。如 2012 年的出口，重庆出口同比增长是 94.5%，安徽是 56.6%，这都表明产业的重心往中西部转移。世界产业重心已经表现出往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转移的趋势。这是世界格局的一个转变大势。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出口产量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 2012 年同比增长了 8.7%，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57.6%，较 2011 年提升了 0.4 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主要依靠中高技术含量工业品出口的国家。

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 2000 年的 6.5% 稳步提升到 2011 年的 25.7%，中国已逐步取代韩日成为美国的主要机械产品供应商，当然这与日韩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也有关系；日本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 1996 年的 7.2% 提高到 2011 年的 42.7%；金砖四国中，巴西机械和运输设备来自中国的份额已从 2000 年的 2% 上升到 2010 年的 16.7%，占俄罗斯的份额相应的从 2000 年的 1.3% 提高到 2010 年的 11.8%。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技术出口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加速下降趋势，如下图所示：

Trade balance of high-technology goods, by selected region/country: 1998–2010



SOURC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全球工业体系中，中美两国的位置变化可以从双边贸易中管窥。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海关 2012 年前 10 个月与美国之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达 274.6 亿美元，占同期上海关区对美贸易顺差总值的 41.8%。2012 年前 10 个月，上海关区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出现了 34.4% 的降幅，反倒是属于低端工业品的未锻造铜及钢材的进口大幅增长 15 倍。在进口金额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商品中，初级原材料竟然占据了四位，包括初级形状的塑料、废金属、未锻造的铜和钢材以及棉花。



西方“再工业化”是画饼充饥

西方能否重塑繁荣？西方的“再工业化”前景如何？这是关系到世界体系未来演化方向的根本问题。

实际上，欧、美、日的人口、债务、社会因素以及工业技术本身的原因已经决定了西方的“再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最近在一篇引起美国舆论热议的论文《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中概括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六大“利空”因素：

- 人口：随着美国“婴儿潮”一代退休，美国的长期劳动参与率将逐渐下降。
 - 教育停滞：美国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均落后于其他先进工业国。
 - 收入不平衡加剧：1993 年至 2008 年间，根据通胀调整之后的收入有 52% 都落入了最富有的 1% 人口的腰包。
 -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美国愈来愈多的技术工人就业机会都在被机器人抹掉或者转移到了薪资较低的国家。
 - 能源与环境：美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如碳排税等，都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
- 庞大的家庭与政府债务：美国要将更多开支用于偿债，实体经济投资不足。

尽管戈登的文章引起很多争议，但美国长期增长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自从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就被分成



了两个部分：55 岁及以上人群和 54 岁及以下人群。自从 2009 年 1 月奥巴马就职开始，新创造的职位基本都被 55-69 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占据，也就是那些无法负担起退休后养老费用的阶层。

总计有 402 万个新创造的工作职位被这些老人占据，年轻人呢（54 岁及以下）？一共丢掉了 280 万份工作！奥巴马执政以来，那些正值盛年的人群（25-54 岁）却反而丢掉了 220 万份工作，是所有年龄段中表现最糟糕的。

欧洲的就业参与情况比美国更糟。法国总统奥朗德 2013 年 5 月 28 日在欧盟劳工部长参加的会议上提出警告，“必须紧急行动，600 万欧洲年轻人失业，1400 万没有工作岗位或实习岗位。”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 7 月，欧元区 17 国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24.0%。其中，5 月份希腊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62.9%，为欧盟成员国最高；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该国 7 月份年轻人失业率为 56.1%。欧洲大量年轻人长期失业，无法在黄金劳动年龄积累职业技能，对于欧洲的未来将是长远的损害。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再工业化”纯属纸上谈兵。世界工业中心是从西方转移到中国的，但转移了之后，转回就难于上青天了。工业转移过程有复杂的结构，现在工业转移到中国的很重要的原因，一开始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成本低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有非常好的劳动力基础教育——中小学数理化教育，还有中国的劳动组织性很强，产业配套性很容易跟上，这就导致中国具有独特的“工业活性”。



就技术原因而言，西方也没有可取得大规模突破的前景。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三个技术方向——3D 打印、页岩气、工业自动化所面临的困难我已经在（2013 年 8 月号）《文化纵横》的文章中扼要讲到。这里只就工业自动化方面的问题做一点补充：大规模增加工业自动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个成本非常高，涉及到转换每一个生产流程，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负债，美国支撑不了这么多负债，或者不增加负债，但是售出的产品一开始就必然比较贵，丧失了价格竞争力。此外，自动化系统是丰富操作经验的物化。熟练技工的经验不仅对于现有生产过程十分重要，对于把改进后或者全新的生产过程开发出来更加重要。只有通过他们把新过程摸出来了，才谈得上高度自动化。自动化的难点通常不在关键过程或者动作的自动化，而在于异常情况的处理、人机交互处理、不同状态之间的无缝转换，这些都不是理论或者空想可以解决的，必须要靠丰富的经验。所以自动化降低了对不熟练技工的需求，但不降低对熟练技工的需求。

目前，西方在经济上仍具有的优势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优势，即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上游，可以分配到最多的利润。而支撑这种优势的，主要是历史积累以及品牌因素。而品牌因素的背后是文化因素。举个例子，当今时代，两台不同品牌的手机往往没有实质性的品质差别，并且可能出自同一生产线，但在消费者的认同度上却有巨大差别。这背后的因素就是文化竞争。

中国崛起所需要突破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工业整体水平，而是金融与文化竞争力。



金融危机 5 年来的世界经济局势，表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基础。对中国而言，金融危机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在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通过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和产业标准体系来挤占中国的利润。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品牌建设方面加强布局和努力。